

再论百济武宁王陵形制与构造的若干问题

赵俊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通过武宁王陵形制构造与同时期同等级梁墓的比较, 提出其形制构造的渊源既有南朝因素, 也有百济本地因素。武宁王陵是在百济丧葬观念的指导下, 由梁朝宫廷匠师建造的。总体看, 该墓的墓葬特征具有复合性, 是南朝化的百济墓葬。

关键词: 武宁王陵; 形制与构造; 渊源; 建造者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自百济武宁王陵被发现以来, 各国学者从考古、历史、宗教、社会生活等多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建树颇丰。其中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武宁王陵在形制构造、随葬品上体现的南朝墓葬特征展开,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廓清。笔者不揣浅陋, 试图在前贤成就的基础上, 通过对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特征的再探讨, 追溯这些特征的渊源, 重新审视武宁王陵的建造者, 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武宁王陵的形制与构造

武宁王陵^[1]位于韩国忠清南道公州西北的宋山里墓地, 是一座带有墓道、甬道的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图1)。墓道和甬道均位于墓室南面, 墓道长9.3米, 平面呈梯形, 口部较窄, 与甬道相接处较宽。甬道长2.9米, 宽1.04米, 高1.45米, 用莲花纹砖以“四顺一丁”法砌筑两壁, 以“三顺一丁”法砌筑券顶, 券顶同时使用楔形砖。地面以砖铺成人字纹, 略高于墓室地面而与棺床等高。地面与墓室相接处用一排竖砖锁口, 其上又铺一层平砖。甬道口外左右两侧及券脸上部用莲花纹砖、钱纹砖和素面砖混和平砌, 通高约3.04米。甬道口券脸为两重叠涩式, 口部用剩余砖封堵, 封门砖下部砌法为“三顺一丁”, 上部为平砌。

墓室南北长4.2米, 东西宽2.72米, 以棺床为基准, 高度为2.93米。墓室前部约长1.05米的一段地面低于甬道和棺床31厘米。四壁以“四顺一丁”法砌筑, 侧壁与后壁近直, 券顶用“三顺一丁”法并使用楔形砖砌筑。南北两壁的上部因为券顶收缩而采用平砌法。墓砖模印莲花纹, 顺砖花纹为两个六瓣莲花夹菱格网纹, 丁砖花纹有两个六瓣莲花和八瓣莲花两种, 其中八瓣莲花系用两块砖拼合而成, 四角各配一枝忍冬。在东、西、北壁上共有五个用两块半圆形砖拼合的深约8厘米的火焰形壁龛, 其中北壁一个, 东、西两壁各两个。每个壁

龕里各置一青瓷灯盞，內有灯芯殘迹。壁龕下方树立四块起棱砖和五块平面砖，构成直棱窗形。

墓室后部为棺床，铺抵后壁，与甬道等高。棺床用两层素面砖平铺而成，下层横平铺，上层为人字纹排列。前沿锁口方式与甬道同。棺床与甬道间的地面结构同于棺床。

此外，发掘中还发现武宁王陵有排水沟，全长 18.7 米，宽 5 厘米，开口于甬道与墓室相接处，沿甬道中部向南穿越墓道中部直通到丘陵的斜坡上。沟的结构为：底部用相叠的两块砖横铺成行，再用两块砖在其上左右两侧以中空 5 厘米的间隔纵行排列，然后再在上面横铺一层砖盖顶，最后再纵压一层砖而成。

甬道中部发现王和王妃志石各一块，通过铭文可知该墓为百济武宁王与王妃的合葬墓^[2]，武宁王死于 523 年，葬于 525 年；王妃死于 526 年，葬于 52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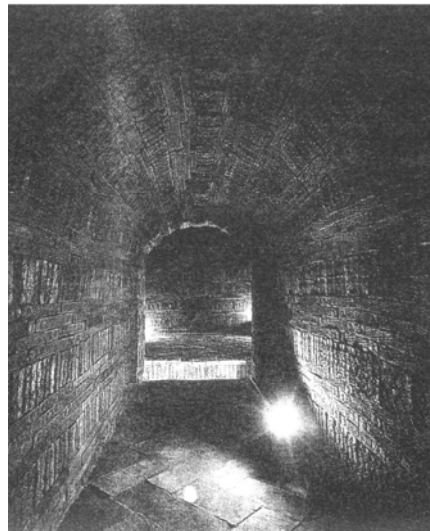


图1 武宁王陵砖室

二、武宁王陵形制构造的渊源

百济与南北朝的交往，文献多有记载，此不赘言。据韩昇先生的研究，百济与北朝和南朝的交往比为 5/33，显示出百济与南朝的密切关系。当南朝偏安江南的心态固定下来以后，其对外关系的价值取向已经逐渐由注重政治军事向注重文化交流转变，而二者间这种文化的交流，到梁朝达到了顶峰^[3]。自武宁王陵被发现以来，其在总体形制和构造上对我国南朝墓葬的承袭以及许多出土文物体现的南朝特点，经过多位学者的考察和论证^[4]，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最近，王志高先生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认识，认为武宁王陵从葬地的选择、墓葬封土、斜坡墓道、排水沟、砖室的形制结构、墓砖上都与建康地区的东晋、南朝墓葬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武宁王陵可以称作典型的“建康模式”^[5]。这一观点实际上将武宁王陵看作为典型南朝墓葬。我们认为，要追溯武宁王陵形制构造的渊源，必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其形制构造与同时期同等级南朝墓葬的再比较；二是探寻其形制构造承袭的本地因素。

百济与南朝隔海相望，二者联系极为紧密；加之南朝墓葬等级森严，且对百济又存在事实上的册封关系，因而我们以为，在比较武宁王陵和南朝墓葬的形制异同时，几乎可以将文化传播的滞后性忽略不计，从而将它们置于相同的年代和等级框架内。年代的不同意味着墓葬形制的变化，等级的高低则体现出墓葬规模、葬制的差异。所以，可用于和武宁王陵作横向比较的应是年代在 525 年前后的梁代贵族墓葬^[6]。迄今可确认或推定属于梁代贵族的墓葬有数座，其中 5 座似为宗室王墓，分别是甘家巷桂阳敦王萧象墓^[7]、桂阳简王萧融墓^[8]以及被推定为安成康王萧秀墓的甘家巷 M6^[9]、被推定为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的白龙山南朝墓^[10]、南平元襄王墓的尧化门南朝墓^[11]。此外，我们拟将年代据墓志为梁普通二年（521 年）的燕子矶梁墓^[12]、对门山南朝墓^[13]、甘家巷 M30^[14]也一并列入考察范围（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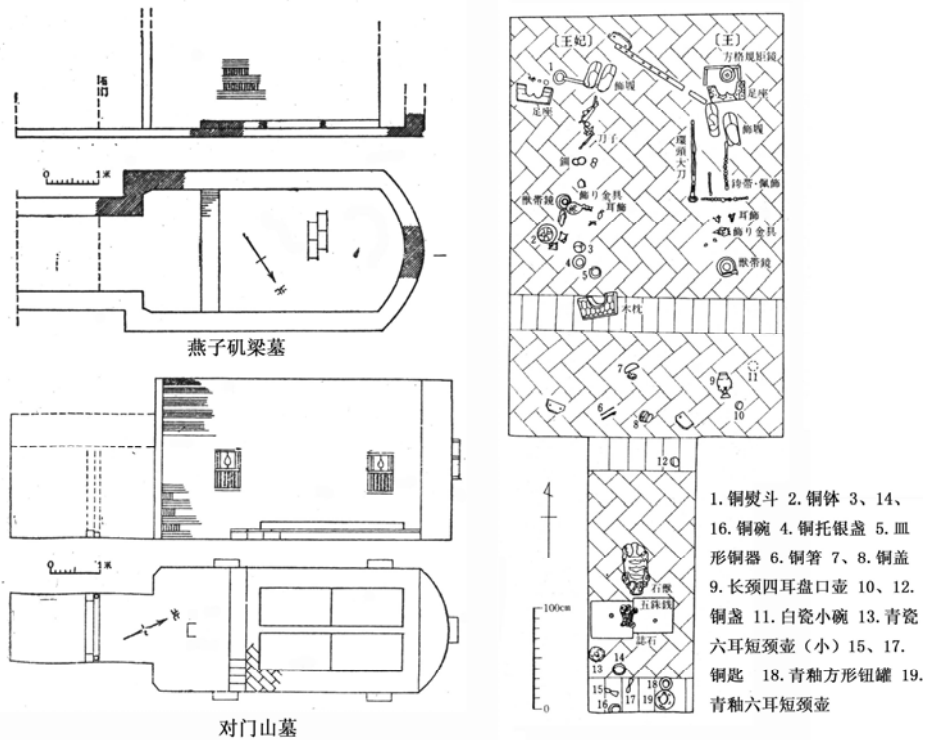


图2 燕子矶梁墓、对门山墓与武宁王陵形制比较（附武宁王陵遗物分布）

下表为武宁王陵与上述墓葬的简要比较：

表 1

（长度单位：米）

位置	墓主	全长	墓门	墓室宽	墓室高	墓壁
南京甘家巷	梁桂阳王萧象	10.5	一进(石)	2.96	2.28(残)	花纹砖
南京甘家巷	梁桂阳王萧融	9.8	一进(石)	3.15	1.78(残)	花纹砖

南京甘家巷	梁安成王萧秀?	10.3	一进(石)	3.25	3.7	花纹砖
南京白龙山	梁临川王萧宏?	13.4	一进(石)	4.42	5.25	花纹砖
南京尧化门	梁南平王萧伟?	10.25	一进(石)	3.48	4.44	花纹砖
公州宋山里	百济武宁王	7.1	一进(木)	2.72	2.93	花纹砖
南京燕子矶	? (辅国将军)	7.4	一进(石)	2.35	1.78 (残)	花纹砖
南京对门山	?	8.76	一进(石)	2.44	3.14	花纹砖
南京甘家巷	萧秀次子萧推?	6.7	一进(石)	1.8	0.5 (残)	?

从规模上看,武宁王陵与梁宗室王墓有一定的差距,略大于甘家巷 M30,而基本与燕子矶墓和对门山墓相当,这表明武宁王陵在形制上反映的等级要低于梁宗室王墓。因此,我们将比较对象选定为以燕子矶墓和对门山墓为代表的大中型梁墓。这些墓葬在形制构造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1、为带长甬道的“凸”字形单室券顶或穹隆顶砖室墓,甬道中普遍设一道门额半圆形的石门,门上多有浮雕仿木的人字架结构。

2、墓室前壁与侧壁以折角相接,侧壁近直或略外弧,后壁外弧。

3、砖砌棺床一般位于墓室中后部,不铺抵后壁,前后均以竖平砖锁口。棺床上多有石棺座,有的在棺床前安置石祭台。

4、墓室内普遍使用各类花纹砖砌壁,以四出莲花纹砖最具代表性,四出钱文砖数量也颇多。

5、侧壁和后壁上装饰有直棂窗,其上设置火焰形灯龕。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武宁王陵虽然也是“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室墓,使用莲花纹砖与钱纹砖砌壁,设有灯龕与直棂窗,但其在细部形态和构造上却与上述梁墓有很大的不同。如甬道设一道木门,侧壁和后壁近直,后壁上部垂直接顶,棺床直接铺抵后壁等,都反映了武宁王陵在形制和构造上的自身特点。王志高先生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区别,他认为武宁王陵的形制与刘宋早期大中型墓葬相近,体现了武宁王陵形制演进的迟缓性,考虑到武宁王陵在墓室内部构造上与梁墓的相似性,进而认为其中缘由与武宁王陵的造墓匠师代表了刘宋的工艺传统,制砖匠师代表了梁的工艺传统有关^[15]。但是,代表晚期传统的工匠将早期的工艺运用到晚期墓室构筑中的可能性还值得进一步考虑。事实上,除了砖室墓的传统以外,刘宋的筑墓工艺似乎并未被后世所继承,这一点也可以从齐梁墓葬的形制构造有别于刘宋墓葬得

到证明。与其一味地从南朝墓葬中寻找武宁王陵形制构造的渊源，我们不如拓宽视野，充分考虑其中某些因素源于百济当地的可能性，重新审视武宁王陵形制构造中诸要素的构成。

在已经发掘的百济墓葬中，石墓数量最多，其中石室墓占有较大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确认的百济高等级墓葬几乎都为石室墓。以王室墓地为例，公州宋山里墓地^[16]已发掘的王陵级墓葬和贵族墓葬中，石室墓占大多数；年代稍晚的扶余陵山里墓地^[17]已发掘的王陵级墓葬与贵族墓葬均为石室墓，这表明百济统治阶级在死后普遍使用石室墓作为埋骨之所。表面看，武宁王陵砖室墓的性质似乎与百济统治阶级的葬制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如果抛开建筑材料的差异，武宁王陵中一些与梁墓抵牾的细部形态和构造倒可以在百济地域内分布的石室墓中找到先例。

京畿道骊州郡梅龙里二号墓^[18]墓室呈横长方形，四壁基线近直^[19]，甬道与棺台等高，棺床敷石，铺抵后壁，墓室地面与甬道相接，低于甬道和棺台，并将棺床一分为二。左右棺台上紧贴后壁处共发现 5 个石枕，表明该墓是五人合葬墓（图 3）。除去为求五人合葬而将墓室筑成横长方形外，梅龙里二号墓的构造理念几乎与武宁王陵完全相同。需要指出的是，武宁王陵中也发现王与王妃的头枕和足枕 4 个，似乎反映出百济墓葬中用枕的现象并不是偶然。此外，在年代约为 6 世纪前后的宋山里一号墓（原报告第五号墓）、四号墓（原报告第一号墓）^[20]甬道底面中央发现有排水沟（图 4），从甬道与墓室交接处一直延伸至甬道外，且深度逐渐增加，构造与武宁王陵的排水沟如出一辙。这一现象表明，最晚在 6 世纪左右，排水沟设施已经被引入百济墓葬的构筑中，不能排除其源于更早时期的六朝墓葬，甚至还可能追溯至 4 世纪乐浪、带方的砖室墓的可能性^[21]。尽管在型式学上尚没有更充足直接的证据证明武宁王陵与上述百济墓葬存在谱系关系，且梅龙里二号墓的年代目前还有争议，但这些墓葬无疑是我们探寻武宁王陵形制本地渊源的重要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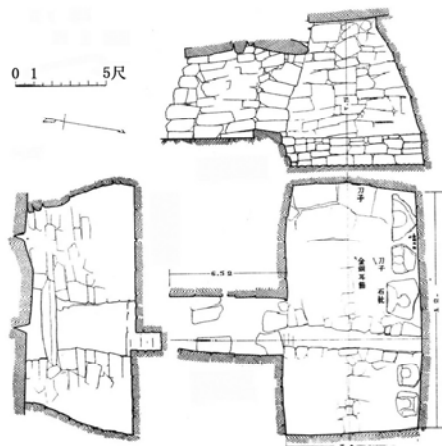


图3 梅龙里二号墓平剖面图



图4 宋山里四号墓排水沟

一些韩国学者也曾对此做过有益的探索，尹武炳先生通过比较公州砖墓和南朝砖墓建造

技法和内部构造的差异，指出百济砖墓所具有的自身特点^[22]；李南爽先生在一方面肯定武宁王陵墓葬制的诸多要素是从南朝导入的同时，又认为如果将筑造材料的差异排除在外，武宁王陵的葬制实际上与百济横穴式石室墓大同小异^[23]。但是他列举的百济券顶石室墓的年代似乎都要晚于武宁王陵，其中还包括陵山里王陵，有颠倒传承关系之嫌。鉴于百济早期墓葬的研究仍显薄弱的现状，要将本文中进行的“点对点”类比扩充为墓葬间形制结构上完整的发展序列，尚有待今后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武宁王陵的建造者

武宁王陵的建造者实际上应该包括烧制墓砖者和建墓者。韩昇先生从文献出发，阐述了梁朝同百济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数次应百济要求向百济派遣工匠的事实，并结合公州出土的刻有“梁官瓦师”的铭文砖指出不仅武宁王陵是由梁朝造墓工匠营造的，而且连墓砖也是由梁朝的制砖工匠制造的^[24]。王志高先生对于武宁王陵墓砖的类型、铭文、纹饰都作了深入研究，并将其与南朝墓葬用砖进行了详细比对，认为武宁王陵所用的砖与同时期梁墓用砖极为相似^[25]（图5）。据此我们应当可以认定武宁王陵墓砖是由萧梁工匠烧造的，在此不再赘述。本部分的论述我们将主要围绕该墓的建造者展开。



图5 武宁王陵与南朝墓墓砖及排列方式比较

我国学者对于该墓的建造者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武宁王陵为南朝工匠所建。其中王仲殊先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东晋、南朝的墓室都建于地下，在营建和待葬期间按理不许一般官民进入观看，埋葬以后更是谁也无从得见。百使者虽数次朝贡，但决无参观墓室的可能性。武宁王陵在形制结构上与南朝墓葬近似，规模宏大，在建造过程中应以百济工匠为主，中国工匠起了指导作用。”^[26]这一观点的思路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但我们对于结论则持不同看法。

锦江流域的百济墓葬一般位于丘陵的南侧倾斜面，墓向大多南北向，高等级墓葬普遍有封土；丧葬习俗上，“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27]，可以看出，武宁王陵在这些特征上都与墓葬中所体现的百济丧葬观念相合。我们以为，丧葬观念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观念，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顽固的内核，它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因外来文化的导入轻易地被改变。百济的丧葬观念中若存在和南朝相同的部分^[28]，并不意味着其源于南朝，更大程度上是两地的人们各自独立形成的世界观、宗教观中对待逝者的相同认识。从随葬器物的摆放位置看，

棺台上武宁王与王妃的随身陪葬器物几乎均为有浓郁百济特点的金属器，而集中体现南朝特征的青瓷器、墓志、买地券、五铢钱均置于墓室前部与甬道内，中间有墓室地面相隔，似乎是埋葬当时有意为之，这表明武宁王陵的葬制具有复合性，一方面已经接受并采用了部分南朝葬制，另一方面，在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棺台上，施行的依然是百济葬制。前述该墓形制构造上显现的不同于梁墓的特点也表明百济不仅固守其葬制，还试图将梁墓的形制构造本土化，而这一过程在随后不长的时间内得以完成^[29]。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武宁王陵是以百济的丧葬观念为指导建造的。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武宁王陵在形制和构造上显现百济特征自然在情理之中。

那么，如何解释武宁王陵中出现的梁墓特征呢？在一个以石墓为中心的地区突然出现一座前所未见，形制构造又很成熟的大型券顶砖室墓，很显然有梁朝宫廷工匠直接参与了墓葬的营建；其次，不同规格用途的墓砖上往往刻有不同的铭文，各类墓砖侧面和端面模印的花纹也各有不同，只有经验丰富的梁朝工匠才能将各种墓砖准确地砌筑于墓室之中。另外，同为砖室墓而年代稍晚的宋山里六号墓中百济文化因素较之武宁王陵明显增加^[30]，其封门砖上刻有的“梁官瓦为师矣”铭文（图6）说明当时百济工匠通过向梁朝宫廷工匠的学习，已经能够自己烧制墓砖，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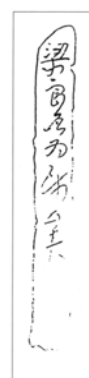


图6 “梁官瓦为师矣”铭文砖

该墓墓室砌砖不如武宁王陵严整有规律，表明该墓可能是百济工匠独立建造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可以从工艺本土化的角度来进一步论证上述的观点。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武宁王陵是在百济丧葬观念的指导下，由梁朝宫廷匠师建造的。从形制结构上看，武宁王陵是一座南朝化的百济墓葬。

四、结语

以上我们讨论了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渊源及其建造者，武宁王陵的形制构造在借鉴梁墓的同时，许多细部构造沿袭了早一时期的百济墓葬，它们更早的源头或许应到年代更早的高句丽石室墓甚至乐浪、带方的砖室墓中去寻找，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关注早一时期百济地区与南朝的文化交涉。

另一方面，武宁王陵之所以认同并采用部分梁墓的构建方式，使墓葬性质具有复合性，归根到底和当时两国亲密的政治外交关系密切相关。日本学者江介也把这种属性归结为“由与特定的国家或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而选择或被规定的属性”^[30]，其说甚是。在传世的梁“职供图”中，百济使者在东亚各国使者中排名居首^[31]，显示出梁对百济的态度；同时，

- [13] 同[12]。
- [14] 同[9]。
- [15] 同[4]: P168-170。
- [16] 野守健等:《公州宋山里古墳調査報告》,《昭和二年度古蹟調査報告》第二冊,朝鮮古蹟研究會,1935年。
- [17] a) 野守健、小川吉京:《大正六年度古蹟調査報告》,朝鮮總督府,1920年。b) 梅原末治:《扶餘陵山里 東古墳群の調査》,《昭和十二年度古蹟調査報告》,朝鮮古蹟研究會,1938年。
- [18] 同[16]: P28。
- [19] 事实上,由于石材的限制,使用“割石”构筑的石室墓墓壁基线很难达到平直,只有晚期一些使用加工精美的石板来构筑墓室的高等级墓葬才能做到。
- [20] 同[16]: P7、P20。
- [21] 同[16]: P7。
- [22] 同[4]: a)条。
- [23] 李南奭:《百濟石室墳研究》,P236-239,學研文化社,1995年。
- [24] 同[3]: P200。
- [25] 同[5]: 165-167。
- [26] 同[4]: f)条。
- [27] 《北史》卷九四·百濟,中华书局。
- [28] 同[5]: P158-159。
- [29] 由于此观点涉及武宁王陵、宋山里六号墓、宋山里五号墓的相对年代关系,而学界对此尚有不同看法,参见: a) 尹武炳:《武寧王陵と宋山里 6 号墳の構築構造에對한考察》,《百濟研究》5,忠南大學校百濟研究所,1974年。b) 姜仁求著,冈内三真訳:《百濟古墳研究》,P90-94,学生社,1984年。c) 齋藤忠:《百濟武寧王陵と中心する古墳群の編年の序列とその被葬者關する一試考》,《朝鮮學報》81,1976年。笔者拟另文探讨。
- [30] 宋山里六号墓的形制构造与出土随葬品的具体情况参见 a) 輕部慈恩著:《百濟美術》,寶雲社,1946年; b) 《百濟遺跡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1年。
- [31] 江介也:《魏晉南北朝墓の分類と地域性・文化圏》,《東亞考古論壇》創刊號,忠清文化財研究院,2005年。
- [32] 王素:《梁元帝(职供图)新探》,《文物》1992年第2期。

More Discussion on the Modality and Conformation the Peakche Muryung King Tomb

Zhao Jun-ji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the transverse comparison of the Peakche Muryung King Tomb and tombs of Liang(梁)Dynasty. By seeing about the modality and characters of the conformation, and open out that the Peakche Muryung King Tomb are 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the conformation of the early tombs in Peakche. the Peakche Muryung King Tomb which was built by Palace craftsman of Liang(梁)Dynasty, under the Funeral idea of Peakche. Total see, it shows the Compound of characteristic and it was a Peakche tomb having the south dynasty(南朝) turn.

Key words: Muryung KingTomb; modality and conformation; origin; builder

收稿日期: 2008-05-25

作者简介: 赵俊杰, 男,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